### 第一财经首席评论 | 田国强：经济学教育改革践行者

**视频** <http://www.yicai.com/video/5205830.html>

**访谈人**：第一财经主持人 张媛

**嘉宾：**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高等研究院院长 田国强

**张媛：**当时您从美国德州的A&M大学获得了终身教授的一职，但是还是选择了回国来担任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院长，为什么做出这样的选择?

**田国强：**我觉得这个是跟多重原因有关系的，跟我人生的经历，跟我家庭的熏陶，跟我在国内外生活的一种强烈的对比，使我下了这个决心。因为我是50年代中期出生的，下过乡，当过农民，然后读了大学，最后出了国。我当时一出国，就是四个字，两个词，一种就是震撼，一种就是痛苦。震撼就是说一个国家怎么会这么的富裕，按我们现在的发展跟美国相比基础设施更好，特别是大学，但当时给我强烈的对比那是不可想象的。另外一个就是痛苦，咱们中国人也不笨，为什么会这么贫穷呢?所以说那个时候，我就立志学好以后要用到中国的改革方面去。我们那个时候所有留学生，关心起国家大事差不多是晚上吃完饭六点，谈论到早晨七点钟，十多个小时探讨中国往何处去，关心祖国的发展，中国改革的历程，就是这么一个过程，痛苦的过程。我在1991年拿到终身教授以后，差不多每年都要回来几次，尽量在中国许多地方调研，亲历改革开放所取得的成就，希望把自己的所学所用用到中国的发展和改革当中去。所以说我这一辈子就是关心两个事情，一个就是中国经济改革，中国改革，所以我写了一本书叫《中国改革：历史、逻辑和未来》，另外一个就是中国的经济学教育，因为感觉到中国没有一所世界一流的大学，而中国的大学生将近有四分之一是学经济学和商学的，但是我们的课程体系，我们的师资队伍，我们培养的学生的素质离中国改革和可持续发展的需要差距还很大。这个时候上海财经大学有一个非常了不起的校长，就是谈敏校长，当时就是想进行财经类的国际化。在这种情况下，我就想不妨试一试，以前也不知道上海财经大学是一所什么样的学校。

**张媛：**所以在您接触这个offer之前您对于上海财经大学的了解程度并没有那么多，一方面你作为改革者，可能成为第一批吃螃蟹的人，成功了，但是有可能也不成功，可能就成了殉道者，这个过程中您内心的考量过程是怎样的?

**田国强：**我家庭，我父亲是为共和国打天下的，是新四军，参加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有一种军人的执着，做事情要干就一定要把它干成，或者说至少我努力了，这是我一方面的想法，就是有一种担当和一种执着在里面，我觉得这个是挺重要的。再一个我的专业是专门研究制度设计的，机制设计的，也知道怎么样把一件事情办成。同时我在选择上海财经大学之前将近十多年的时间，我是每一年回来两三次，对中国的国情比较了解，所以说我是有备而来的，并且我也充分考虑到了改革的艰巨性和困难性，我也知道其实中国经济学的改革是隔行不隔理，和小平的改革方式是非常接近的，就是说做增量改革，做渐进式的改革，做有序的逐步的改革，做加法。所以说我一上来就提出来了六大改革举措，就是一个学科，一个学院怎么发展起来，就是学科建设，师资队伍的引进，人才的培养，科研的体制，人事的制度和管理，它应该是一个综合治理的，一个多维互动的，一个缺一不可的，这么一个改革的过程。

**张媛：**这是一个从无到有的运作过程，一方面您有一套非常先进的理念，但是还要结合当时上海财大的一个现状，体制的问题，制度的问题，所以您的理念结合现状，当时是如何来运作的，把您的理念推广出去。

**田国强：**我首先第一个上来的就是所有的校领导，我一一拜访，包括建立良好的关系和信息对称，所有的职能部门包括研究生院、教务处、组织部、人事处、科研处、宣传部、统战部，全部拜访。沟通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许多误解、误会是由于信息不对称造成的。

同时我的改革是先从最不引起反弹的地方改起，比如说我第一件改革就是把学生的数理基础加强，把本科生的数学课程改为《数学分析》，因为这只是针对本科生改的，他是最没有太大反弹的领域，然后再推到研究生的改革。在这种情况下，好多事情会慢慢地、越来越多的人认同你这个改革。我当了院长以后，很快厦门大学请了洪永淼当了王亚南经济研究院的院长，张维迎一直都是副院长，很快被扶正为光华管理学院的院长，钱颖一被任命为常务，最后很快被认定为院长，西南财经大学甘犁被任命为院长，后来包括现在武汉大学、南开大学等许多大学找了一批海外学者做院长，这就是上海财大的模式。

**张媛：**那么在这个过程中您不只是说对于制度、学科的教育进行了改革，包括对教材也做了改革，用十年的时间写出来《高级微观经济学》这本教材，而之前学生的教材大部分都是用西方的课本翻译过来的，您的这本教材和西方的教材区别是什么?

**田国强：**因为大家知道，中国的改革主要是经济改革。中国的人才培养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关于经济学和商学的人才培养，但是绝大部分教材特别是高级教材，甚至本科生的教材，基本上是外国人写的翻译过来的，或者说在外国人的基础上，再把它简写、书编而成的。而《高级微观经济学》这本教材，我2004年到上海财经大学以来，我是亲历而为的，每年给我们的博士生上高级微观经济学这门课程，使得我有这么一个契机，把我英文的教材扩充一倍，将近1300页，形成了这么一个教材，它有三个特色或者创新。

第一是融入了中国的元素，融入了中国的改革和治理方面的内容。因为上世纪80年代是有思想没学术，现在经济学教育在很多情况下是有学术没有思想，我们为什么不能做到有学术的思想，或者有思想的学术呢?我们希望的是在严谨、科学地介绍这些学术的同时结合中国的国情，结合中国的改革，阐明这个理论的指导性意义在什么地方?它的缺点在什么地方?第二是我这本书可以像一本字典，它具有收藏价值，它介绍到乃至最前沿的主要的微观经济理念，都在我这本书里面，足够的与时俱进。这是第二个特色，就是它的前沿性、严谨性、思想性和学术性的有机结合。第三就是理论的创新，我们学生对很多理论都是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不知道它的来龙去脉，所以我用22章介绍了44位经济学家的人物小篆，这种写法在高级经济学，特别是微观经济学基本上也是没有的，在海外也是没有的。当然我这个书也是集体的智慧，得到了我们经济学院老师、博士生各方面的帮助。总的来说是一个尝试，抛砖引玉。

**张媛：**就像您说的，中国从大国向强国转变的过程当中，包括话语权的转变，包括学术话语权。其实您的这本教材也是在学术话语权过程当中贡献的一块基石。那您提到说您做的还不够，所以提到大国向强国、向话语权、学术话语权转变的过程当中，您认为在教育这块的改革还需要做什么?

**田国强：**我觉得两块，简单来说就是世界一流，中国崛起。首先既然是经济学科，那能不能对经济学科在方法论，在理论方面，特别是结合中国的情况，能不能做出一些原创性的研究，按照世界的标准公认的，这是我们一直强调的。我们培养的学生就是怎么样培养一个经济学家，科学的经济学家和科学的经济学老师，就必须要有内在逻辑的理论分析，这么一个素养，这么一个要素。

同时要有历史比较分析的训练，以及量化的统计分析的训练，这样才能真正培养出创新性的人才，有后劲的人才。那么，教材当然毫无疑问是非常重要的基础。我觉得培养人才，一定要青出于蓝胜于蓝。说实话，我们由于这个时代，由于智力的有限，错过了很多学习的机会，但能不能够让我们学生，我们培养的下一代能拿诺贝尔奖呢?这是一种使命，一种目标，一种事业，不是把它当成工作，而是把它当一份事业，一种理想，一种梦想来做。

**张媛：**说到整个中国大学的改革，看到国家其实对于高等教育的投入一直在增加，但是其实说到中国大学，似乎在全世界一流大学排名当中，其实中国的大学排名并不是特别靠前，以您在国际的经验来看，这是为什么呢?

**田国强：**是个很好的问题。说实话中国学术现在数量很大，大而不强，大而不精，真正原创性的研究很少，原因是体制。我经常说的一句话，中国只有一所大学，这个大学就叫教育部大学，其他都是分校。为什么?因为校长的任命、学科的规划、管理、资金的调拨全部都是教育部来决定的，我讲的是教育部部属大学。当然中国的教育确实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培养了很多人才，这个是不可否定的，但是为我们国家的长远的发展，从中国从一个大国到强国这样一个要求，从中国的长治久安，从中华民族的复兴，还是远远不够的。说实话，我到上海财经大学，我们一切都是规范化的管理，制度性的管理，并且少干预。我现在虽说是个院长，学校是把财权、人事权和管理权三权都交给我，但我这三权全部都委托代理出去了。

**张媛：**那您怎么管呢?

**田国强：**这个就是老子的无为而治是有两个先决条件的，第一个基本的制度，第二个管理团队。基本的制度，基本上可以管80%，也就是说只要我们的人员按制度做，80%可以做。然后你的管理团队管15%，你最多管5%，我需要做的事情就是为他们分忧解愁，他们解决不了的事情我帮着去解决。

**张媛：**我们看到最近的时候，11月上旬的时候，在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林毅夫和张维迎两位教授针对产业政策话题引起了一场激辩，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您和林毅夫教授关于有限政府还是有为政府这样的争辩也引发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您和林毅夫教授的观点主要分歧在哪里?

**田国强：**那么产业政策争论的实质其实就是政府的定位的度应该在哪个地方，我跟林毅夫的争论就是这个政府职能定位的度在哪个地方。我谈到的理想状态是有限政府，他谈论到的理想，包括现实当中的是有为政府，一字之差，天壤之别。因为无论是按照十八届三中全会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的作用，解决政府的错位、缺位和过位问题，必定要界定政府不是事事都有为，在某些方面应该是无为的。比如说在竞争性的行业，在市场发挥作用的地方，它应该是无为的。但是有为政府的定位首先就排除了无为，那么它的边界是无界的，有限政府的边界是有界的，这是一个最大的差别。

**张媛：**您和张维迎教授的观点一致吗?

**田国强：**我和张维迎在学术上大方向一致，他们两个我批评的就是都很有一点语不惊人死不休，走极端。林毅夫是过度肯定了政府的作用，张维迎是过度肯定了市场的作用，张维迎是否定市场失灵的，林毅夫基本上是否定政府失灵的，我觉得这都不是。一个有效市场的必要条件是一个有限的政府，什么叫有限的政府?并不是说政府不管，而是政府的定位的角色要合理，实际上我们真正的整个产业政策，包括现在有为政府，实际上针对一个国人非常关注的问题，中国改革何去何从的问题。中国的改革在过去30多年，实事求是说，经济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举世公认的，甚至历史有文字记载以来没有过的这么一个成绩。但是由于没有注重治理的逻辑，在许多方面，政府应该补位的地方而没有去做。那么我们讲的有限政府，它实际上就是一个维护和服务性的政府。那么维护在什么地方?维护国家的安全，社会的稳定，市场的持续，合同得到严格的执行，包括私有财产的保护。同时还要服务，主要是提供解决市场失灵的方面，比如说公共卫生，因为它有外部性，有传染病，公共教育、义务教育、生态环境，解决贫富差距过大的问题，这些问题是需要政府的补位的，但是现实当中政府没有这样做。所以我们讲的有限的政府，只有在你要市场在资源的配置中发挥决定性的作用，必须让政府是一个有限的政府，发挥好的而不是过多的作用。